

# 印刷媒介中的 尖石鄉泰雅族李崧山事件記憶

劉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 中文摘要

發生於 1910 年到 1912 年的李崧山事件 (Tapung 事件)，迄今已逾 110 年。該事件泛指 1911 年 8 月到 1913 年 9 月期間，台灣總督府從攻占李崧山到鎮壓卡奧灣 (Goagan)、馬里光後山群 (Mrqwang)、基那吉群 (Mknazi) 乃至霞喀羅群 (Skaru) 的一系列討伐。這個強烈衝擊北泰雅族和尖石地域社會的事件，泰雅族人長期無法掌握該事件的話語權與記述條件。在地域振興的需求下，挖掘與李崧山事件有關的文化記錄，釐清記憶層位 (Memory Horizons)，逆讀並重新結構它與尖石泰雅族集體記憶的關係，是必要的工作。本文嘗試以李崧山事件為中心，整理風景明信片 (繪はがき)、報導文學作品、報紙討伐新聞、理蕃人員記事、後代耆老口述，分析尖石鄉泰雅族重大歷史事件在不同時期印刷媒介上的再現，透過梳理李崧山集體記憶的層位與樣態，盼望挖掘和釋放更多底層記憶。首先，從二〇年代以尖石後山馬里光群、基那吉群人物為主題的風景明信片開始，揭開地方被壓抑與被凝視的歷史。其次，透過報導文學作品，揭示七〇年代漢族作家關切山區原住民議題時，如何看待 Tapung 事件的影響，記錄了哪些戰爭記憶和反抗記憶，這些當地人的記憶具有什麼價值。最後，將

尖石鄉耆老在 2000 年後的口述回憶，比對《理蕃誌稿》裡日本討伐警察隊員的回顧，指出李嶼山事件乃係山地戰爭的本質。

關鍵詞：尖石鄉、Tapung 事件、李嶼山事件、泰雅族、戰爭記憶、集體記憶、記憶層位、風景明信片（繪葉書）、古蒙仁、陳銘磻

# Memories of Atayal Lidongshan Incident in Jianshi in Print Media

Liu, Liu Shu-Qi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Lidongshan Incident (Tapung Incident), which happened from 1910 to 1912, has passed for more than 110 years. This incident generally refers to a series of crusades occurring from August 1911 to September 1913 from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s occupation of Lidongshan to its suppression of Goagan, Mrqwang, Mknazi, and even Skaru. Although this Incident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Atayal and Jianshi Region, the Atayal people could not control the right to speak or narrate the Incident for decades.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and fundamental to organize literary writings regarding Lidongshan Incident, excavating memories in the first layer and re-structuring its relation with the related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 Atayal people in Jianshi. Centered on Lidongshan Incident, this paper organizes how various texts, including landscape postcards (ehagaki), reportage, news, official documents, and oral lore from the tribe seniors, represent th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incident for the Atayal, and scrutinizes how they had become each layer of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regarding the Atayal Lidongshan Incident in Jianshi to further release more bottom layer memories.

First, the paper will begin with the landscape postcards focusing on the people of Mrqwang and Mknazi in the 1920s to expose the suppressed and gazed local history. Next, through reportage, it will disclose how the Han Chinese writers in the 1970s perceive the incident's aftermaths when considering mountain area indigenous people issues. How their works record the memories of war and resistance and embed what values in the locals' memories. Finally, to point out the nature of the Lidongshan Incident is mountain warfare, the text will compare the memories of the tribal seniors in Jianshi regarding the Incident after A.D. 2000 with the Japanese police's review in the *Journal of Ruling the Indigenous People*.

**Key words:** Jianshi Township, Lidongshan Incident, Tapung Incident, Atayal, war memories, collective memory, memory horizons, landscape postcard (ehagaki), Gu Meng-ren, Chen Ming-pan

# 印刷媒介中的 尖石鄉泰雅族李嶼山事件記憶\*

## 一、前言

李嶼山事件(Tapung 事件)迄今已 110 年,該事件泛指 1911 年 8 月到 1913 年 9 月期間,台灣總督府從攻占李嶼山到鎮壓卡奧灣(Goagan)、馬里光群(Mrqwang)、基那吉群(Mknazi)乃至霞喀羅群(Skaru)的一系列討伐。日本軍警對相當於今日尖石鄉、五峰鄉、復興區一帶不願歸順和繳交槍枝的泰雅族進行掃蕩,激起泰雅族聯合抵抗,死傷慘重。

這個強烈衝擊北泰雅族的事件,歷經 2003 年行政院原民會推動「原住民族部落重大歷史事件」調查後,終於有泰雅族學者官大偉教授以專書為這段歷史發聲<sup>1</sup>。新竹縣也將該事件納為「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資源<sup>2</sup>。但是由於日本殖民體制及戒嚴時期「去日本,再中國化」的情境,泰雅族長期無法掌握該事件

---

\* 本文為筆者科技部人文司專題研究計畫「高山探險文本、殖民地觀光媒介與台灣原住民族再現：以濁水溪上游與玉山山區為範疇」(MOST 106-2410-H-007-083, 2017/8-2019/7)之部分成果,曾在「歷史風華與文藝新象——第四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投稿期間另蒙兩位匿名專家給予指導。此外,承蒙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於筆者參與「画像資料(繪葉書・地図・旅行案内・写真等)による帝国内文化の再検討国際共同研究会」(2014-2015)期間,提供該中心圖書館收藏的《繪葉書帳：台灣風景繪葉書》翻拍,謹此一併致謝。

<sup>1</sup> 參見張洋培、林瓊柔,《原住民族部落重大歷史事件：李嶼山事件研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年)。官大偉,《李嶼山事件》(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年),頁 68-70。

<sup>2</sup> 參見王恭志,〈新竹泰雅族勇士參與李嶼山事件歷程分析及其對鄉土教育的啟示〉,《竹縣文教》第 44 期(2013 年 12 月),頁 79-83;以及徐榮春,〈新竹縣尖石鄉嘉興國小辦理泰雅族 Nahuy 小學實驗教育課程計畫書〉,嘉興國小學校內部文書。

的話語權。在地域振興的需求下，整理與李崧山事件有關的文化記錄，挖掘更多記憶，重新結構它與尖石鄉泰雅族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關係，是必要的工作。

本文嘗試以李崧山事件為中心，整理風景明信片（絵はがき）、報導文學作品、報紙討伐新聞、理蕃人員記事、後代耆老口述，分析泰雅族重大歷史事件在不同時期印刷媒介（print media）上的再現，透過梳理尖石鄉泰雅族李崧山集體記憶的層位與樣態，盼望挖掘和釋放更多底層記憶。首先，從二〇年代以尖石後山馬里光群、基那吉群人物為主題的風景明信片開始，揭開地方被壓抑與被凝視的歷史。接著，透過報導文學作品，揭示七〇年代漢族作家關切山區原住民議題時，如何看待 Tapung 事件的影響，記錄了哪些戰爭記憶和反抗記憶，這些當地人的記憶具有什麼價值。最後，將尖石鄉耆老在 2000 年後的口述回憶，比對《理蕃誌稿》裡日本討伐警察隊員的回顧，指出李崧山事件的戰爭性質。

## 二、被視覺化的反抗者：風景明信片中的馬里光群與基那吉群

本節將從一組以馬里光群、基那吉群人物為主題的套裝風景明信片開始，揭開新竹縣尖石鄉後山地方在日治時期被壓抑的歷史。

2014 年筆者在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圖書館，偶然發現日治時期台北赤岡兄弟商會印刷和發行的一組彩色套裝明信片。總計 26 張，每枚大小 10×15cm，無出版時間，發行人不明。信封套長 32cm，中間印有「台灣風俗繪葉書」標題，左側註記出版者資訊<sup>3</sup>。

<sup>3</sup> 佚名，《繪葉書帳：台灣風景繪葉書》（台北：赤岡兄弟商會發行，年份不詳），現藏京都市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圖書館。本文使用的明信片圖像感謝下列單位授權、提供或提供翻拍：圖一、圖二、圖八由國家圖書館提供。圖三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提供。圖四、圖六之一、圖七為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圖書館提供，（來源：<https://www.nichibun.ac.jp/pcl/ja/>，2020 年 12 月 22 日）。圖五為翻拍自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上）》（台北：國家圖書館，2003 年），頁 85。圖六之二翻拍自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世紀容顏（上）》，頁 109。圖九翻拍自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世紀容顏（下）》，頁 57。圖十為國立臺灣圖書館提供。

隨著 1900 年日本郵政法允許私人印製明信片之後，揭開明信片的時代。1904 年到 1906 年日俄戰爭期間，遞信省首度為慰問出征士兵、紀念開戰和凱旋而發行的明信片大受歡迎，使得明信片不只流行於國內，更有宣傳國策、展示治理和文化介紹等功能。明信片與報紙同等速度傳播圖像，讓大眾看見陌生土地的風景、名勝和風俗，解析度卻超過報紙單色照片，因而在二十世紀前半葉風行一時<sup>4</sup>。

《繪葉書帳：台灣風俗繪葉書》（以下簡稱《台灣風俗明信片》），以平地的風俗名勝為主，有三分之一左右位在蕃界（特別行政區），其中有四張在標題上標示マリコワン（馬里光群／Mrqwang），一張標示キナジー（基那吉群／Mknazi）。出版商為何選用這五張並非大眾觀光可及的風景人物圖像，並突顯族群或部落名稱，引起了筆者的注意。馬里光群為泰雅族的活躍亞群，曾與基那吉群聯合抵抗「五年計畫理蕃事業」（1910-1915 年），讓人不由得意識到分布於新竹縣尖石鄉的這些族群與李嶼山事件的關聯。

李嶼山屬於雪山山脈北段桃竹屋脊的最高峰，是大漢溪與油羅溪的分水嶺，泰雅族稱為 Tapung，附近蘊藏樟腦、檜木、煤礦等資源。日治初期樹杞林支廳蕃地首開支廳設置先例，隘勇線設廢頻繁，先後設有 70 處駐在所<sup>5</sup>。官方將分布於李嶼山和魯壁山之後者稱為「マリコアン後山蕃」，將分布於油羅溪上游之嘉樂溪、武羅溪流域者稱為「マリコアン前山蕃」，但兩者往來密切。

分布在桃竹的 Mrqwang 群、Mknazi 群、Goagan 群為抵抗隘勇線作戰及森林樟木等掠奪，曾在 1910 年到 1913 年間結合宜蘭廳太魯閣族，與官方軍警爆發激烈衝突。台灣總督府經過三次大規模戰役，首先建置李嶼山、那羅山隘勇線，與天打那山、內橫屏山等隘勇線銜接；接著，攻占馬美到烏來戰略要地，新增馬里科灣隘勇線、馬石隘勇線，建造馬美山、烏來山、馬石三處砲臺，瞰制馬里光群。最後，1913 年打通尖石後山通往霞喀羅方面的通道，於馬里光溪

<sup>4</sup> 參見二松啓紀著，郭清華譯，《繪葉書中的大日本帝國》（台北：麥田，2020 年），頁 16-19。

<sup>5</sup> 參見林一宏、王惠君，〈從隘勇線到駐在所：日治時期李嶼山地區理蕃設施之變遷〉，《臺灣史研究》14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74-76。

兩側山稜建置西堡溪隘勇線、屯諾富士羅灣隘勇線，配置兩個砲臺，瞰制基那吉群部落，完全控制尖石前後山。

《台灣風俗明信片》涉及李嶼山周邊地域的明信片總計八張，有三張在桃園廳，五張在新竹廳。以下，首先介紹角板山方面的明信片。角板山，在今桃園市復興區，為日本據台後積極控制的山區之一，一〇年代角板山社已成為蕃界治理的示範部落。圖一到圖三分別從交通、產業、教育，展示台灣總督府統治下新時代的「蕃地生活」。

圖一：「蕃界鐵線橋 MANNERS OF FORMOSAN」。一位原住民男性在充滿陽光的日子，穿著輕薄的傳統罩衫，前胸斜掛背袋，愜意地走在一座簇新的鐵線橋上的姿影。版面下方以日、英雙語提示內容。參酌生蕃屋本店發行的〈角板山の鐵線橋 (Kappanzan A Suspension Bridge at Kappanzan)〉明信片，可知為角板山橋下溪流為大料崁溪，即大漢溪中游<sup>6</sup>。同款彩色與黑白明信片，可見於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發行者為赤岡商會，時間約二〇年代。

圖二：「角板山蕃人ノ水田耕作 Savage Plazants, Kappanzan, Formosa」。五位男女在平坦山谷的水田中除草，站立的兩位為構圖焦點。穿著漢人服飾的中年女性，在勞動中間叉開手腳直立，目露疲態地對著鏡頭瞪視，給予觀者不友好的第一印象。另一位背對鏡頭而立的男性，彷彿在小憩間，被鏡頭自然



圖一



圖二

<sup>6</sup> 參見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來源：<https://reurl.cc/b6Ye3X>，2019年11月8日)。

捕捉。然而他不只以服飾圖騰讓這幀照片散發民族情調，他的旁視更將讀者的視線帶離，引導到後方連綿水田和更多勞動者的大現場。同款彩色明信片，可見於臺灣記憶系統，發行者為臺灣物產館，時間約二〇至三〇年代。



圖三

圖三：「角板山蕃童教育所 The School For Young Savages Kappanzan Formosa」。一位警官專注督導，教室以大幅日本地圖和五彩繽紛的萬國旗為基調，襯托出 32 位學童。學童穿著花樣各異的和服，分齡就座，收斂情緒，或誦或讀。攝影空間被安排過的痕跡性明顯，底端最高處的



圖四



圖五

天皇夫婦御影和兩側懸掛的大幅教育敕語，使教室沉浸於日本在台推動的近代教育秩序裡。同款彩色明信片，可見於臺灣記憶系統，發行者為生蕃屋本店，發行時間不詳，應在 1909 年 10 月角板山蕃童教育所設立之後。

圖四開始的五張明信片，拍攝對象都在新竹廳樹杞林支廳蕃界，集中在今日尖石鄉後山的秀巒村和玉峰村。

圖四：「ハカ社蕃人 BARBARIANS HAGA」。Haga 社，又稱 Kin lwan 社，現名錦路，位於今秀巒村 10-11 鄰，屬於基那吉群。這家的擺拍（staged photography），父著胸兜、布披風，表情內斂。稚氣未脫的少年配戴獸皮披肩，面露猜疑，父子都配有腰刀。母穿長背心、胸兜、腳套、小腰袋，抿嘴，似有若無地微笑。

圖五：「マリコワン蕃 BARBARIANS MARIKOWAN FORMOSA」。一群武裝男性，在高山的合影。被鏡頭框定的立者，手持長槍。蹲踞者手持長矛，其中兩位配掛蕃刀。四位男子配合攝影師表現面容、肌肉、武器、服飾與頭巾，沒有征戰感，蠟像似的，展示意味濃厚，但眼神不無幾分無奈。未標地點，依標題推測為當時馬里光群分布地（包括今油羅溪上游和玉峰河流域）。同款彩色明信片，可見於臺灣記憶系統，發行者為赤岡兄弟商會，時間約二〇年代。

圖六：「マリコワン蕃人出草の景 BARBARIANS MARIKOWAN」。描繪 Mrqwang 群出草的情景。持槍埋伏的勇士潛藏在菅茅叢生的溪畔，預備向下狙擊。繁盛的草木掩不住三人精壯的軀幹，子彈彷彿一觸即發。這也是精心布置的編導式攝影，內容聳動，刻意營造的部落日常時間和駭人聽聞的風俗，充分迎合了讀者獵奇的心理。彩色版在台灣圖像資料庫中沒有收錄，黑白版則可見於臺灣記憶系統，發行者為赤岡商會，時間約二〇年代<sup>7</sup>。

圖七：「マリコワソ蕃婦機織 FORMOSA」。一位辛勤使用地織機的女性，露出誘人的豐滿乳房，臉上紋面清晰，還背著一個嬰兒。她雙腳踢動織機，手無間斷地工作，似自然地偶然回望，事實上是不可隨意亂動地配合多次取景拍攝。圍繞在她身邊的十名幼童，暗示了豐沛的生育力。他們或蹲或站，身上披掛布衫或現代服飾，色彩豐富，最左邊裸身的小男孩也能引更多想象。



圖六之一



圖六之二

<sup>7</sup>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來源：<https://reurl.cc/M7jj6n>，2019年11月1日）。



圖七



圖八

這張明信片的黑白照片，可見於井上伊之助 1925 年出版的《生蕃記》（圖七）。依據井上的圖說，這位婦女是「馬里光群的トミーヌン・チンリガン」<sup>8</sup>。臺灣記憶系統另有同場景，但角度不同、小孩較少的另一幀照片（圖八），出處標示《臺灣寫真大觀》，標題為「蕃婦的紡織（泰雅族）」<sup>9</sup>。另外，台灣大學日治時期繪葉書資料庫也有再增加另一名抱著幼兒的婦女，總計 13 人的照片，標題為「台灣リリユン社蕃婦の機織 Savage woman at weaving, Formosa」，發行時間為 1920 年左右<sup>10</sup>。

透過多張圖像交叉比對可知，這應是私人相館的攝影師前往尖石後山，在 Llyung 社（今玉峰社）對 Tbin・Lihang 女士及部落孩童的同一主題攝製。攝影師必須邀請模特兒、布置場景、編導姿態、多角度拍攝，再予著色或維持單色，供應給不同商家刊載或發賣。

圖九：標題為「タラカス蕃生活，芋ヲ焼て食事 BARBARIANS TARAKAASU」。Tarakaasu 是基那吉群位於薩克亞金溪畔的深山部落——



圖九

<sup>8</sup> 井上伊之助，《生蕃記》（東京：警醒社書店，1926 年），前置頁 7。井上曾在該書 1913 年 1 月 12 日日記，提到有台北來的照相師。

<sup>9</sup>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寫真資料庫〉，（來源：<https://reurl.cc/ObjlVr>，2019 年 11 月 8 日）。

<sup>10</sup> 國立臺灣大學，〈日治時期繪葉書資料庫〉，（來源：<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card>，2020 年 10 月 8 日）。

栗園。Trakis 為小米之意，位於今秀巒村 13 鄰。相片記錄該社居民在高山上的農作。一男兩女在高山峻嶺中的燒墾地休息，山坡上搭有簡單工寮，背簍置於三人中間，烤煮地瓜的白色炊煙冉冉上升。狀似悠然的被攝者皆旁視他處，心思似在鏡頭外自己的時空。此張明信片在臺灣記憶系統中也有典藏，發行者為赤崗商會，時間約為二〇年代。

綜合上述八張明信片，前三張展示了桃園廳「角板山示範蕃社」的進步情景，後五張則呈現傳統的新竹廳「奧山蕃社」。英文解說以 barbarian 或 savage 描述原住民族，誠如當時《臺灣日日新報》常用的「獐猛」一詞，讓讀者衍生「未開化、野蠻、原始、野性、凶殘」等想像。上述明信片圖像無論何者，都有明顯的編導虛構和布置痕跡。它們之所以看起來栩栩如生，在於攝影師努力傳達現場性、日常性與互動性。除了圖六和圖九採用窺視者視角，營造意外撞見的效果之外，其餘照片都配置了視線的回看者，與讀者對望，滿足讀者「用眼睛走入蕃社觀光」的欲望和驚喜。

筆者將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典藏這套《台灣風俗明信片》，比對台大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漢珍公司「臺灣百年寫真 GIS 資料庫」，發現重覆者甚少。然而，卻存有一些明信片的黑白版或相片原圖，也有內容酷似只是細節或構圖稍有出入的同系列作品，顯示素材不變，但選配與組裝已有多種作法。許多相片原圖出自 1911 年遠藤寬哉等人出版的《台灣蕃族寫真帖》，亦有圖像一模一樣卻由不同商會發行的明信片。依此推測，取材於馬里光群和基那吉群的這些泰雅人物風俗照片，極可能是台灣最早開設的照相館——諸如遠藤寫真館攝影師入山拍攝後，供應給赤岡兄弟商會、生蕃屋、台灣物產館等印刷業者，並形成一個攝繪、印刷、封裝、發行的生產鏈。銷售圈除了日本帝國統轄地，也不排除中國或外國。

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日本本土興起東亞觀光熱，殖民地名勝在「外地旅行」或「殖民地旅行」等品項下被旅程化、標籤化，定價為異國情調商品。南島民族在體質和風俗文化上的特色，於包括朝鮮、關東洲、滿鐵附屬地在內的日本觀光市場中獨樹一幟，是「台灣觀光」特色元素。1920 年以後，濁水溪上游、玉山和阿里山山區率先被納入原住民觀光旅程，佐藤春夫的台灣之旅系列小

說，日本最大旅行機構「日本旅行協會」1924年創辦的《旅》雜誌的宣傳，都促使殖民地觀光風行<sup>11</sup>。旅行手冊（旅行案内）、風景明信片（繪葉書）、照片集（写真帖）等印刷媒介及商品也應運而起。

除了原始、野性、異國情調想像之外，商會選用示範部落安居樂業的圖像，或營造未開化風俗引發旅行者的現代優越感，都符合台灣總督府的政策方向。1924年《旅》創刊後，以外地特輯號打造「用身體體驗帝國領土的旅行圈」，1925年總督府與《旅》聯手行銷台灣觀光，前總督府地理課長野呂寧受邀在雜誌上發表〈去吧！看吧！永久居住吧！〉一文，大力鼓吹台灣旅行。該文強調台灣的治安與衛生已改善，航線頻繁，「因此，各位，去台灣旅行吧！去台灣吧！不，乃至永住台灣吧！」<sup>12</sup>野呂寧呼應了後藤新平〈台灣觀光訓〉的論述：台灣曾是瘴癘黑暗之地，承蒙先驅者的奉獻始有今日，因此「去台灣」，見證治理奇蹟，非比一般旅遊，乃是意義非凡之旅。

風景明信片，風行於大正時期殖民地旅行熱興起之後，在總督府行銷台灣觀光的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達到高峰。《台灣風俗明信片》套組，有意地選用李崧山事件中抵抗最烈的後山各群，滿足讀者的獵奇。在旅行商品的凝視和編碼下，讀者在接觸一幅幅精美圖像的同時，也透過民族稱謂、部落名稱、風俗、肢體、高山風景等等符號，被植入民族偏見和文化歧視。殖民主義話語因而散播、編碼、銘刻了泰雅族被討伐的歷史傷痛及生活實況。

最快速記錄和傳播泰雅族被武力討伐實況的印刷媒介，是截至1924年時發行部數已達18,790份的《臺灣日日新報》。在1911至1912年李崧山隘勇線及馬里科灣隘勇線的前進期，討伐新聞經年累月在固定版面刊出，每隔一段時間

<sup>11</sup> 相關資料可參考全國中等學校地理歷史科教員協議會編，《台灣省台灣旅行報告》（一）、（二）（台北：成文，1985年複刻本，1932年出版）；やまと新聞台灣支局編，《台灣週遊概要》（台北：成文，1985年複刻本，1927年出版）；李資深編，《台灣案内》（台北：成文，1985年複刻本，1931年出版）；日本旅行協會台灣支部編，《台灣鐵道旅行案内・昭和十四年版》（台北：日本旅行協會台灣支部，1939年）；張良澤、高坂嘉玲合編，《日治時期（1895-1945）繪葉書：台灣風景明信片（全島卷）》（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2013年）；遠藤寬哉、岡野才太郎，《台灣蕃族寫真帖》（台北：遠藤寫真館，1911年）；成田武司編，《台灣生蕃種族寫真帖（附：理蕃實況）》（台北：成田寫真製版所，1912年）等。

<sup>12</sup> 野呂寧，〈行け見よ而して永住せよ〉，《旅》2卷12期（1925年12月），頁10-15。

就配置照片，從毛筆繪製的「討蕃畫報」、低畫素攝影到高畫素攝影，用於對外報導長官巡視，以及警察、人夫、軍人鋪路、架橋、設砲、運補、戰鬥等艱鉅推進的動態。及至 1913 年 6 月基那吉隘勇線推進期已逼近「五年計畫理蕃事業」總結階段，橫跨新竹、桃園、宜蘭三廳的警察隊更在陸軍討伐守備隊支援下聯合作戰，佐久間總督上山巡視慰問或滯陣指揮的消息，頻頻報導。1913 年 9 月 5 日系列戰役結束，總督搭乘專用火車從桃園站抵達台北站，隨行軍警在喇叭隊、市民團體、學生團體夾道歡迎呼喊萬歲下步入凱旋門，這一幕也被披露於隔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文中也肯定本島人父老的由衷歡迎「特值欣慰」等等<sup>13</sup>。

最後，軍方和官廳限用的戰鬥照片和報上刊載過的圖像，又被精選輯錄於總督府監修的《討蕃記念寫真帖》出版<sup>14</sup>。這本以「討蕃事業政績記念」為宗旨的寫真帖中，有不少報紙上未揭露的關於泰崗、斯馬庫斯、鎮西堡社、塔克金社……被占領、繳械、威嚇、拘禁、降伏、歸順、訓喻、施食、剪髮的照片，至於南投、宜蘭方面的討伐行動更留下不少集體俘虜、繳槍、乃至砍頭和殺戮的照片。

圖十為 1913 年陸軍步兵第一聯隊第十二中隊，針對位於圍剿基那吉群補給要衝的馬美社(マメ社)實施「示威運動」之後，脅迫社眾蹲踞合影的照片。未見於《臺灣日日新報》，僅見於寫真帖<sup>15</sup>，不過 1913



圖十

<sup>13</sup> 不著撰者，〈佐久間總督の凱旋〉，《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9 月 6 日，第 2 版。

<sup>14</sup>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二年討蕃記念寫真帖》(台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3 年)，參見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來源：<https://reurl.cc/k0RLv3>，2020 年 12 月 20 日)。

<sup>15</sup> 參見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寫真資料庫〉，(來源：<https://reurl.cc/>

年 8 月 26 日的報紙記事，曾對陸軍守備隊派遣水谷中隊實施「示威運動」之概況有所報導。軍方認為馬美社等盤踞要地之社，表面投誠（1911 年第一次李崧山戰役後），暗中從事偵查和反間工作，並以種種理由拖延規避銃器彈藥押收，因此須予「示威運動」（軍服用語）。該篇報導寫道：

各地屯駐軍隊猛然開進蕃社施行吶喊演習，有的吹奏喇叭顯示堂堂軍容，有的手持銃劍對每戶臨檢，給予各種威示運動。此行動能使著實頑冥不遜的蕃奴頓時束手無策，把銃器交出，並哀求軍隊立刻從蕃社退出……如今全如待宰羔羊，老幼男女瑟縮顫慄。<sup>16</sup>

台灣總督府透過大眾媒介《臺灣日日新報》的常態報導傳播官方立場的信息，輔以《討蕃記念寫真帖》等直觀性圖像，制約李崧山事件的詮釋方向與言論標準，對此事件集體記憶第一層位造成絕對性的霸權。媒介文化刻意呈現的泰雅族形象，在預期的主流讀者（內地的日本人、台灣普通行政區的內、台人）心中，難以磨滅。儘管戰事期間及其後，有井上伊之助、森丑之助等人為泰雅族請命<sup>17</sup>，但在公共領域更多可見的是日本人及漢人投稿於報紙，謳歌李崧山戰役或佐久間總督的詩歌文章。至於泰雅族——這場山地戰爭中遭槍砲威嚇和封鎖的主角，往往是帝國新聞再現和視覺技術凝視下最凶殘或最沒有聲音的一群。直到風景明信片有如傷口上的花覆蓋的二〇年代之後，泰雅族仍然不是自身民族圖象和歷史記憶的擁有者及消費者。他者的銘刻和流行商品，持續主導著李崧山事件詮釋和「獐猛」形象的生產，弱小民族至多只能在不公平的合作拍攝時，以瞪視、旁視、木然的演出、若有所思、無奈的疲態、對殖民者的微笑，透露深埋的苦痛和抗拒<sup>18</sup>。

bRLnyX, 2020 年 12 月 20 日)。

<sup>16</sup> 不著撰者，〈タケジン支隊の動靜，蕃地縱斷と各要害の占領〉，《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8 月 2 日，第 2 版。

<sup>17</sup> 柳書琴，〈井上伊之助《生蕃記》研究：隘勇線社會的風俗誌〉，《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92 期（2019 年 11 月），頁 149-150。

<sup>18</sup> 梁廷毓，〈凝視下的破口：烏居龍藏的台灣原住民攝影中之違抗面孔〉，《原住民族文獻》第 34 期（2017 年 10 月），頁 68-85。

### 三、Tapung 事件與黑色的部落：1978 年台灣報導文學的尖石年

李嶼山事件結束後，隨著山區統治的落實，民間照相館得以入山物色題材，布置場景，營造意象。《台灣風俗明信片》召喚「理蕃」戰爭記憶，增加商機。無論是被接受同化教育的新世代、會種稻的「土著」，抑或男獵女織的「奧山蕃人」，五年計畫以武力討伐確立的山地國有化體制，是這些泰雅族主題明信片得以生產的前提。因此馬里光群與基那吉群被旅行商品視覺化，也就隱喻了該族群及其傳統領域的被征服和秩序化。

被視覺化的泰雅族，不只沒有自身文字可以生產對抗論述（counter discursive），連身體和風俗也成為征服者用來編碼自身的符號。帶有文化歧視、誇耀殖民功績、也向本島人（漢族）顯示統治權力的這些文本，盛行於泰雅族被討伐傷口未癒的二〇到四〇年代的「後李嶼山時期」，筆者將它們歸類於尖石鄉李嶼山事件集體記憶的第二個層位。第二層位適值撫育政策施行的年代，這時期的出生者雖未經歷討伐卻也是創傷噤聲的一代。其中的極少數或曾與長輩一起受邀拍攝照片，但非這些商品的消費者或主要受益者。

在新興的視覺媒介裡，當地民族被物化，也被東方主義化。觀光凝視與商業利益，抹除了那些砲聲隆隆、血流成河的真相。第一層位為 1911 至 1913 年間官方利用《臺灣日日新報》和《討蕃記念寫真帖》，對三次李嶼山戰役的報導和攝影紀錄。第二層位的美麗商業文本，在同化教育、授產、移住的背景下，逐漸淡化了《臺灣日日新報》對李嶼山系列戰役的制度性報導。那麼，在李嶼山事件之前一、兩年的前置掃蕩階段，筆者稱為「第零次李嶼山戰役」的時期，我們能否從他者的記錄中逆讀泰雅族處境，拼找民族主體的記憶碎片呢？

李嶼山三次戰役構成了李嶼山事件的第一層位記憶，在七〇年代迄今有關「理蕃政策」、隘勇線前進、李嶼山事件、理蕃設施的研究中，已有大量描述<sup>19</sup>。

<sup>19</sup> 重要著述除本文已引用者之外另可參見：林柏燕，〈前進李嶼山〉，《新竹文獻》第 13 期（2003 年 8 月），頁 6-33。姜義鎮，〈李嶼山古戰場〉，《新竹文獻》第 13 期（2003 年 8 月），頁 34-47。黃榮洛，〈李嶼山方面前進記（明治四十四年，1911）〉，《新竹文獻》第 13 期（2003 年 8 月），頁 48-57。傅琪貽，〈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原住民抗日歷史研究——以北台灣泰雅族抗日運動為例〉（北京：團結，2015 年）。

1970 年後，官方文獻檔案被學者以台灣史事的角度逆寫，進行台灣山區抗日史事的建構，它們的重要性是重啟漢人社會關注李嶼山事件，其成果又直接啟示了第三層位的作家古蒙仁的歷史認識。但是，1911 年以前更底層的在地部落記憶，卻在 1978 年報導文學獎中意外露出。本節將透過兩位漢族作家對 Tapung 事件的理解、他們對當地人反抗記憶的再現，了解尖石鄉李嶼山集體記憶在戰後浮露的樣態及價值。

七〇年代，尖石鄉罕見地受到台灣社會關注。首先，是秀巒村的泰雅族運動員張金全（1950-），在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後的低迷氣氛中，接連於 1973 年第一屆、1975 年第二屆亞洲田徑錦標賽中跑出亮麗成績，成為電視台轉播焦點<sup>20</sup>。其次，在台灣光復三十週年紀念的 1976 年，出現了名為〈李嶼山抗日史蹟調查〉的學術論文<sup>21</sup>。楊緒賢教授將事發之後到 1945 年殖民結束前諱莫如深的該事件給予「台灣史事」、「抗日事件」的高度評價。第三，1978 年漢族作家古蒙仁與陳銘礪不約而同報導尖石鄉歷史與現況，且在文壇新創的「報導文學獎」連袂受到肯定。

七〇年代初期，小說家古蒙仁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現實的邊緣」專欄的邀請下，開始一系列有關漁村、礦村、部落的報導書寫<sup>22</sup>。他從亞運明星張金全之口，首次得知秀巒村的存在，1978 年便以〈黑色的部落——秀巒山村透視〉（以下簡稱〈黑色的部落〉）獲得「第一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推薦獎」，出版後四年間連續再版四次。該文同年被收錄於《黑色的部落》一書出版<sup>23</sup>。此書不只使「黑色的部落」成為斯馬庫斯（Smangus／新光部落）與司馬庫斯（Smangus）<sup>24</sup>的代名詞，「走出黑色部落」的經驗迄今仍為當地部落永續共營

<sup>20</sup> 張金全，1969 年獲台灣省運會男子一萬公尺田徑賽冠軍，1970 年獲得冠軍並破全國紀錄。1973 年於第一屆亞洲田徑錦標賽一萬公尺賽跑中獲得第八名；1975 年第二屆亞洲田徑錦標賽中再獲五千公尺第五名及一萬公尺第四名，其中五千公尺項目所破之全國紀錄還保持了 26 年。

<sup>21</sup> 參見楊緒賢，〈李嶼山抗日史蹟調查〉，《臺灣文獻》27 卷 4 期（1976 年 12 月），頁 87-95。

<sup>22</sup> 古蒙仁（1951-），本名林日揚，台灣雲林人。小說家、報導文學家、記者、主編、大學教師、文化局長，曾獲「第 10 屆吳三連獎報導文學類」等多項榮譽。

<sup>23</sup> 古蒙仁，〈黑色的部落——秀巒山村透視〉，《黑色的部落》（台北：時報文化，1978 年），頁 165-209。

<sup>24</sup> 尖石鄉玉峰村第 14 鄰，1979 年開始才有電力供應。

的佳話；也為報導文學的提倡推波助瀾；更成為學者蕭阿勤所謂保釣運動「回歸現實世代」之山地關懷的一種類型。它激起了《人間雜誌》、《山海文化》等社群對原住民議題更深廣的關懷，不愧為「台灣報導文學發展中不可等閒視之的經典之作」<sup>25</sup>。

〈黑色的部落〉兩萬餘字，從族群、產業、風俗、教育各方面，報導作者1976年下半年蹲點所見的部落振興過程。新光部落（斯馬庫斯），原屬鎮西堡部落，是基那吉群的重要部落。Smangus 原指高山櫟，衍生義為「櫟樹茂密，獵物豐富，土壤肥沃之地」，位於塔克金溪左岸，今秀巒村第八鄰，海拔約1650公尺。鎮西堡（Cinsbu）位於新光部落上方約二公里，第九鄰，海拔約1720公尺，意指「曙光最早照到，終年陽光充滿，土壤肥沃之地」<sup>26</sup>。

古蒙仁開篇便詳述從竹東鎮進入秀巒村的交通狀況：首先，須在九贊頭辦理入山證，之後由新竹客運終點站那羅徒步四十分鐘抵達道下，再上坡三小時至宇老分界嶺。從標高1450公尺的宇老下行，至田蒲約七點五公里，步行需兩小時。再蜿蜒而下三小時，可至兩溪匯流地秀巒。橫越部落後方的百尺吊橋後，攀行三小時可抵泰崗。最後沿塔克金溪向基那衣山脈深入三小時，「那些低矮的竹屋，坍塌的竹籬，小狗的吠聲，光著屁股的泰雅小孩，一個個都變得清晰了。那兒，就是新光。」<sup>27</sup>耗時兩天抵達，使古蒙仁稱這段旅程為「茫茫天涯路」<sup>28</sup>。

新光，既是日照充足之地為何又會淪為「黑暗的部落」呢？作者有兩層解釋：第一，1979年以前此地電力未達，是全台灣最晚通電的地方：

世界消失了，泰雅人點起的燭炬在部落裏黯淡地燃燒著，吃過飯不久，他們就得上床睡覺了。因為上帝賜給他們的是一個完全的黑色的部

<sup>25</sup> 陳銘礪，《大地阡陌路》（台北：業強，1990年），頁60。

<sup>26</sup> 新光部落，總戶數48戶，人口233人。參見林修澈，《台灣原住民部落事典》（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年5月），頁127。

<sup>27</sup> 同註23，頁169。

<sup>28</sup> 古蒙仁使用的九贊頭，今名九讚頭。田蒲，今名田埔。基那衣山，キナジ山，今名基那吉山、金納吉山。西舊斯山，今名西丘斯山，標高2444公尺。薩加牙珍溪，今名白石溪，又名薩克亞金溪。馬里克灣、馬里闊丸、馬里科灣，今稱馬里光。

落，愛迪生的手伸不到這麼偏遠的山地，光明離他們仍然是十分的遙遠啊！<sup>29</sup>

第二，李嶼山事件造成的打擊。古蒙仁詳細介紹了三次交鋒：第一次，發生在拉號社、田勝台等地之李嶼山隘勇線推進期；第二次發生在馬里科灣隘勇線推進期；第三次發生在基那吉隘勇線推進期：

民國二年，日本總督府下定決心要討平他們，在該區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大戰。計動員三千軍警，分屬四個大隊、砲隊、救護隊，另有挑夫嚮導無數，大舉入山。並將總司令部設在李嶼山上，由民政廳長官親任總指揮官。面臨大軍壓境，基那衣番毫不示弱，轉戰各山區，與日軍展開慘烈的惡鬥。李嶼山上的砲聲震天，殺聲震野，基那衣番被猛烈的砲火炸得支離破碎、身首異處，他們依舊前仆後繼，衝鋒陷陣。漫山的腥風血雨飄灑下，這場慘絕人寰的血戰終於結束了。<sup>30</sup>

古蒙仁吸收了楊緒賢的觀點與成果，但戒嚴體制下不免有該時代常見的論述框架和話語限制。譬如：一，不直述殖民機構：提到「總司令部」設在山頂，由「民政廳長官」指揮作戰，所指其實是「隘勇線前進本部陸軍司令部」和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署長「大津麟平」。二，與國軍抗日論述連結想像：譬如「山胞不因因而屈服」、「決心死守，浴血奮戰」、「前仆後繼，衝鋒陷陣」等修辭。三，襲用日文文獻未充分清理日本觀點：譬如，「日本總督府下定決心要討伐他們」、「暴露在白砲的火網之下，無所遁跡」、「配置白砲，防止他們突圍」等。

然而，古蒙仁已給予讀者認識這個事件的許多線索，譬如「史無前例的大戰」、「挑夫嚮導無數，大舉入山」、「漫山的腥風血雨」、「慘絕人寰的血戰」等，都是泰雅族遭「血洗」的記述。前後文中，亦可讀見日方原本不敵，大肆增設通電鐵條網、白砲，動員砲隊、救護隊之後，才壓制泰雅族。而基那吉群誓死

<sup>29</sup> 同註 23，頁 178。

<sup>30</sup> 同註 23，頁 174-175。經過三次戰役，台灣總督府打通了尖石後山通往霞喀羅方面的通道，並以「西堡溪隘勇線」、「屯諾富士羅灣隘勇線」，瞰制後山各部落。

抵抗等敘述則是楊緒賢等第一代研究者在逆讀日文討伐史之後暗亮的抗暴身影。古蒙仁詳述史事意圖指出——台灣總督府「動用軍警」鎮壓導致後山的泰雅族長時間弱化，傷痕之深超越一甲子。

隘勇線前進政策以分割和包圍等戰術，搭配討伐及限制物品供給等威壓手段，達到落實山地國有化的目的。Tapung 事件，是泰雅族各群聯合向殖民者進行的對決。然而，迄今梳理部落記憶仍不容易，因為從 1911 年到古蒙仁撰文的七〇年代，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或日本人）並不知道或已遺忘這個縱橫雪山諸餘脈、牽延多年的戰爭，對泰雅族造成的致命打擊。有關此事的討論在事件結束後被壓抑 65 年，二〇年代以後官方控制諸山，同化教育、集團移住、授產、水田耕作、皇民化、軍事人力徵用前仆後繼。爾後報章雜誌上雖有尖石前山、後山的地方消息<sup>31</sup>，但樹杞林蕃地並沒有像阿里山、日月潭或霧社那樣變成觀光勝地，而是朝向水田、果園等農牧地域發展。

1920 年後殖民政府開始鼓吹後山部落向前山移住。新竹州廳勸導「集團移住」的前山處所有四：一、那羅溪流域的那羅；二、錦屏溪流域的比麟、竹園；三、油羅溪上游內灣南岸的馬胎；四、油羅溪上游的新樂、水田<sup>32</sup>。在官廳規劃下，翻山越嶺從馬里光河階地或海拔 1700 公尺以下的高地遷出的人口，在前山移住部落闢建耕地，建築水圳，開始了對官廳依賴較高的生產型態和社會組織。在淺山地帶被析離的馬里光群和基那吉群，到 1945 年日本戰敗前行政控制薄弱時，部分遷回後山。歸返之後，面對的卻是百廢待舉的荒蕪聚落和舊墾地。

筆者之所以重視古蒙仁及陳銘礪的地方報導作品，是想關注作品中的李崧山歷史敘事。上述作品皆寫於戒嚴時期發展主義盛行的半世紀前，作品中指涉的意識型態在後殖民運動持續前進的今日已然落伍。誠如蔡政惠所言，〈黑色的部落〉描寫部落的飲食習慣有如受罪、肯定保留地政策、讚許民族主義教育等等，是文明論觀點和漢人中心主義下的偏見<sup>33</sup>。不過，我們也應看見古蒙仁在

<sup>31</sup> 前山、後山的分界嶺，包括李崧山、魯壁山、東穗山等。

<sup>32</sup> 同註 5，頁 114。

<sup>33</sup> 蔡政惠，〈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自 1945 到 1987〉（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年），頁 424-444。

〈後記〉描述，離開四個月後依然理不盡的對部落的掛記與憂懷，所反映的七〇年代平地知識分子受到原住民被壓迫歷史震撼的認識歷程。

在新光部落蹲點半年的古蒙仁，是當時極少數洞察到這場遠去的高山戰爭，對後山泰雅族烙下的傷痕歷久未癒的報導者。他的鬱結、震撼乃至優越感，反映平地人的認知結構，因此能使〈黑色的部落〉喚醒日漸富庶的平地社會驚覺，「山地同胞」還在意想不到的貧困中匍匐。古蒙仁透過歷史之眼，勾勒脫落在台灣經濟起飛列車之外的尖石後山部落。他向讀者大眾提出莫忘山地的兄弟姐妹們，呼喚大眾思考——重返祖居地三十年，依然落後的這般令人驚訝的黑暗模樣，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

#### 四、尖石前山抗日記憶：〈部落裡的一次事件〉、〈最後一把番刀〉

古蒙仁〈黑色的部落〉成功帶動社會議題，使地方的殖民史浮出，在後殖民時期出現最初的清理。它是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的三十年後，第一篇由漢人創作的李崧山事件文學。無獨有偶，另一篇屬於李崧山事件集體記憶第三個層位的先驅之作，也出現在「第一屆時報文學獎」，那是陳銘礪獲得「報導文學優等獎」的散文〈最後一把番刀——高山族的昨日、今日、明日〉（以下簡稱〈最後一把番刀〉）。陳銘礪另有小說〈部落裡的一次事件〉描寫泰雅族在青蛙石一帶狙殺日警的事件，本節將一併討論。

短篇小說〈部落裡的一次事件〉原載聯合副刊，描繪「山鳶一號」五名青年阻止日本人入侵的事件。故事開展於叔姪爭執的場面，17歲青年「達利斯」毅然離開部落，投入夜襲日本部隊的行列。他沒有把計畫透露給身為頭目的叔叔，導致叔叔們和族人對他無法理解的舉止有不少非議。事實上，達利斯自從探知日軍即將進占山頂之後，便與四位青年秘密策劃突擊。

某夜，他們分成兩組行動，一組直趨崖邊埋伏，一組藏身青蛙石溪谷伺機而動。「山鳶一號」發現日方先遣部隊在人數和武器上皆處優勢，仍不惜決一死戰，終於殲滅所有入侵者。小說結束在三名青年的遺體被迎回部落廣場，

安放在雨神雕像前的一幕。長老引領族人祭靈，眾人悲悽，決心團結禦侮。「明天，是的，或者後天，一場鬼哭神嚎的血戰就會在叢林中展開，我們要讓日本人知道：做一名泰雅魯，除了英勇善戰，還有永不屈服的意志。」<sup>34</sup>

小說以那羅部落流傳的抗日故事為原型，勾勒泰雅青年以生命保全部落與土地的 Gaga 精神，地景包括錦屏村的青蛙石、沙那伊溪、竹林、後山菇寮與杉林<sup>35</sup>。早在李嶼山事件發生前，1906 年佐久間總督啟動武力討伐後，從今日關西鎮及五峰鄉方面逼進的隘勇線戰火已不斷威脅尖石前山和東側地帶。但是七〇年代學界對當地細部情況並不清楚，在錦屏村任教的陳銘礪也不例外，因此故事中充滿地方色彩的襲擊情節令人印象深刻，但時間不明，外敵入侵背景也是模糊的。

筆者核對《臺灣日日新報》，發現在 1906 年起，起自今日五峰鄉油羅山到尖石鄉外橫屏山、內橫屏山、野馬敢溪（ヤバガン，Yabakan，那羅溪的舊稱）、梅嘎浪溪流域，不斷有討伐和衝突。及至內灣上坪隘勇線（1909 年 7 月 25 日到 9 月 10 日）、麥巴來隘勇線（又稱油羅山隘勇線，1910 年 5 月 5 日到 6 月 3 日）、內灣溪上游隘勇線（1910 年 6 月 15 日到 9 月 23 日）推進期間，麥樹仁山、尖石山、拉洛山、外橫屏山、內橫屏山至油羅山沿線，以及加拉排社以上之油羅溪上游兩側的上野山、八五山、田勝台等，皆被隘勇線包納，建構兵戰基地。這三條隘勇線的推進打通從新竹廳進軍李嶼山的左右翼通道，應視為「第零次李嶼山戰役」。「第零次李嶼山戰役」發生於 1909 至 1910 年間，隸屬該事件集體記憶的零層位，卻未被第三層位的學者列入李嶼山事件史的研究範疇，只有第一層位井上伊之助的日記、森丑之助的雜文，以及第三層位的七〇年代耆老口傳，反應了某些片段。

在 1909 至 1910 年間的先導戰役期間，日軍雖利用族群差異或部落敵對關係進行離間、勸降和情報蒐集，但部落出草或聯合抵抗情況不斷<sup>36</sup>。《臺灣日日

<sup>34</sup> 陳銘礪，〈部落裡的一次事件〉，《最後一把番刀》（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3 年），頁 115。

<sup>35</sup> 沙那伊溪，小說中用以指稱那羅溪。2020 年 12 月 17 日，筆者請教那羅部落耆老頂定·巴顏（Tingting Payan），他表示部落人所指為那羅公車站旁匯入那羅溪的小支流。

<sup>36</sup> 譬如，1907 年 7 月 2 日報載，與麥樹仁社敵對的 Mayhuman 小部落頭目密告日軍：前次

新報》1909年至1910年間報導的某次衝突，與〈部落裡的一次事件〉若合符節。譬如，1909年8月12日（內灣上坪隘勇線前進期）的報導：新竹廳討蕃前進隊占領內橫屏山，居民遷逃他處但仍零星游擊，使討伐隊決心奪下內橫屏山頂，以便瞰制野馬敢溪對岸腹地，並向南監視梅嘎浪社、馬胎社、加拉排社、麥樹仁社<sup>37</sup>。又譬如，1910年7月5日（內灣溪上游隘勇線前進期）的報導：野馬敢社前頭目之長子與現任頭目爭執，分頭召集勇士出草<sup>38</sup>，尤其接近「小說中的口傳故事」。小說中雖未指明部落，但二〇年代以前青蛙石附近（今吹上部落一帶）的島田山麓，確實有名叫野馬敢社的老部落<sup>39</sup>。

觀察報紙上的連續報導可知，討伐隊和部落一開始都不能確定彼此意圖。日方甚至看輕情勢，誤判野馬敢社出草是解決內部紛爭。陳銘礪的小說則捕捉到當地人在1909到1910年間第一波侵略到來時，對於是否反應、如何對抗的態度不一。那羅等社牽制李崧山方面日軍的行動，從未間斷。譬如，1911年10月報載：「凶蕃」不斷潛入警戒區線內伺機襲擊<sup>40</sup>。1912年3月報載：「凶蕃」潛往李崧山方向，遭埋伏的日警近距離射殺<sup>41</sup>。1912年9月報載：「蕃人」多次穿越那羅山鐵線網，必須加強警戒<sup>42</sup>。1912年10月報載：「蕃人」潛行第一隘寮的線外，那羅山電線修補隊遭狙擊，巡查員斃命等<sup>43</sup>。日警在前山遭遇狙擊的報導不斷，顯示當地部落持續在反抗。將文學創作與討伐新聞對讀，筆者希

---

討蕃隊砲擊加拉排山北方岩窟時，有麥樹仁社兩人、馬里科灣社三人死亡。6月23日梅嘎浪社則因蕃丁Watan中槍身亡，該社將於三日內在滑石分遣所南方高地集結出草，攻擊附近隘寮。參見不著撰者，〈蕃人の密告〉，《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7月2日，第2版。

<sup>37</sup> 不著撰者，〈新竹前進隊情報 內橫屏山占領後の狀況〉，《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8月12日，第2版。

<sup>38</sup> 不著撰者，〈討蕃隊情報土日出草〉，《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5日，第2版。

<sup>39</sup> 野馬敢社位於今那羅溪、錦屏溪匯流處南側山坡，當時在島田山後方較高處為天打那社（テンタナ）。不過在1924年地圖中野馬敢社便已消失。參見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1907年日治時期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1924年日治時期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來源：<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2020年12月24日）。

<sup>40</sup> 不著撰者，〈新竹前進隊潛入蕃搜索〉，《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7日，第2版。

<sup>41</sup> 不著撰者，〈蕃人要擊，兇蕃二名〉，《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3月28日，第2版。

<sup>42</sup> 不著撰者，〈兇蕃襲來情報ナ口山方面警戒〉，《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9月18日，第1版。

<sup>43</sup> 不著撰者，〈李崧山蕃情電線補修隊狙擊〉，《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0月1日，第2版。

望強調，李嶼山事件存在前山兩翼先導戰役的事實，陳銘礪聽聞的地方抗日故事並非偶然事件。

參照地方州廳密集發佈的「討蕃消息」及當地耆老戰後的記憶，將使我們有機會在殖民崩解、物是人非之後，透過層位式閱讀，理解當地民族口傳的證言。帝國的形，是帝國、地理與文化相互交織的歷史進程。格雷布納（F·Graebner）在其「文化層位分析法」中指出任何文化都會在地域留下印記，新的文化層覆蓋於舊的之上，以上下序列的形式表現，新舊層次穿刺交錯在同一平面，除非例外發生，否則同一層位鮮少為同質區域，正因其混合的特性，所以層位也往往擁有再構的潛力<sup>44</sup>。薩依德也主張在解讀現代西方文化時採取一種類似複調音樂的「對位閱讀法」（contrapuntal reading），將帝國主義和他者的抵抗連繫在一起觀照。透過層位的對位閱讀來分析李嶼山事件相關文獻，我們不僅能洞察帝國欲展示和傳播的一面，也能發現被報社／作者／商家有意排除的另一面，進而想像這些文化遺產中被殖民者的無聲姿影，如何與統治者的堂堂話語抗衡。

泰雅族於李嶼山事件發生時仍為沒有文字的民族，且沒有掌握媒介與言說權力，事後也長久未能參與集體記憶建構，認識到記憶層位（memory horizons）間的競逐與傾軋。事件當事人及其後第一個世代，多不是日文報刊雜誌、明信片的受眾，戰後涉獵與本地民族高度相關之文學作品的族人也不多。所以事件的起訖和經緯被他者依各自需要定義，三次之說成為定論，導致兩翼（另有桃園方面的）的掃蕩與抵抗被遺忘，前山形同無災難無抵抗的歷史空白之地。

陳銘礪汲取口述再現的那羅溪泰雅族戰鬥者身影，使主體記憶的弱音被保存，也使當地人心中李嶼山事件及其先導掃蕩之「戰爭」本質顯露無遺。〈部落裡的一次事件〉以小說為媒介，將口述者的記憶文本化，使短暫記憶，透過印刷媒介的再生產，轉化為長程的集體記憶<sup>45</sup>。

<sup>44</sup> 錢今昔、王星，〈文化地理學的主題與過程研究〉，《人文地理》4卷2期（1989年2月），頁47-51。

<sup>45</sup> 1925年Halbwachs提出集體記憶概念，用以指稱能夠保障一個集團的特點、延續性的記憶，以此相對於沒有保障身分認同作用的歷史記憶，他在《記憶的社會框架》一書中，

陳銘礮榮獲「第一屆時報報導文學獎」的〈最後一把番刀〉，通過文學獎體制的肯定，同樣有助於尖石地方記憶朝泰雅族集體記憶發展。〈最後一把番刀〉報導前山部落在七〇年代公路開通，遭到平地文化和影視媒體襲捲時，以「一把番刀」隱喻「李嶼山精神」。這篇報導文學作品從耆老回憶開始：

為了瞭解現階段留守山地的人群，他們處在文明激盪中的心態，我特地走訪那羅村一位姓謝，六十七歲高齡的老人，他在年輕時，曾跟隨他的父親參加『李嶼山之役』的對日抗戰。<sup>46</sup>

老人提到他年幼時被日本人奴役，被迫跟父親去李嶼山開路；又提到，日警不許族人配刀，一次父親帶刀外出工作遭毆打囚禁，卻不忘把刀藏入密洞，因為番刀是用來保護自己與家園的，他堅決不願失去。老人反顧，如今他的長孫一心想到平地當歌星，一句「這是什麼時代了，還用番刀」的頂撞，終於使他傷心地把「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最後一把番刀」擲進湖裡。然而，老人相信孫子最後仍會不適應，回來那羅種香菇。作者敬佩老人的信念，但還是相信「文明無法被徹底拒絕」。

〈最後一把番刀〉透過世代對比，傳達部落年輕人被主流文化襲捲的現實。事實上，文化媒介對部落價值取向的影響，在後李嶼山世代參加地方州廳主辦的參訪活動中已見端倪。1933年12月10日起為期11天，新竹州大湖郡的霞喀羅群及大溪郡的卡奧灣群各20人，被安排參觀台北、基隆方面泰雅族部落的文化設施，以及新竹州的「先進蕃社」。在李嶼山事件過去二十年的此時，早年抵抗的大豹社、那羅社已是被參觀的移住示範部落了。以下，是來自於桃竹的後山部落參觀溪口台社和那羅社之後的感想：

那羅社的水田，是他們沒去狩獵又花了數年的苦心才完成的。該地也建造有堆肥屋舍，以我們現在的耕作方法，雖然不會直接感覺有必要，但是遷移後是需要的。<sup>47</sup>

---

清楚說明符號系統、認同框架、社會框架對於集體記憶的影響。參見，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37-43。

<sup>46</sup> 同註34，頁170。

即使不在雪見、卡奧灣的偏遠山區生活，遷移到溪口台、奎輝那樣的平地附近，也能過著安樂的日子，為什麼祖先要反抗呢？有想要怨恨祖先的心情。<sup>48</sup>

鼓勵移住前山並種植水田，是這次官辦活動的目的。儘管參訪者很務實地觀察生活與生產的面向，但在警察整理的參訪者發言中，「為什麼祖先要反抗呢？」這句尖銳的質疑，卻有意暗示與李崧山抗日世代背道而馳的立場。

理蕃警察介入的代理發聲，被印刷在台灣總督府理蕃課《理蕃之友》上，形成後李崧山世代有別於風景明信片之異國情調，另一種在官方治理媒介下塑造的勤勞進步的馴化形象。《理蕃之友》是專為宣示官方政策並報導原住民族動態而發行的月刊，提供給全台理蕃警察使用，1932年創刊號時發行量5000部<sup>49</sup>。治理媒介的再現和文化商品的符號，是李崧山事件集體記憶第二層位中的兩大內容。三〇年代被政策扭曲的參訪者發言「有想要怨恨祖先的心情」，和七〇年代嚮往都市的青年反駁「這是什麼時代了，還用番刀」，顯示記憶的雪崩持續著。

在李崧山事件幾乎已被台灣社會遺忘之際，漢人作家卻記下當地人一息尚存的記憶。劉智濬認為雖然〈最後一把番刀〉與〈黑色的部落〉都存在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外部眼光<sup>50</sup>，但陳銘礪於文末以在地人錦屏國小阿雲老師用山地語向青年說話的一幕作結，具有主體發聲的意識。

在第一屆報導文學獎中，〈最後的番刀〉挖掘了第一層位的故事，〈部落裡的一次事件〉撿拾一〇年代先導掃蕩中的零層位記憶。略加比較可以發現：古蒙仁關注三次戰役，參考漢人學者對此事件最初的歷史評價，當時正是該事件開始被納入台灣史論述的階段，因此古蒙仁強調該事件導致了後山發展的困境時，不局限於地方層次思考，而能帶動平地人的共感。陳銘礪則另闢蹊徑，向耆老取經。他採錄的個人記憶和地方記憶雖有視野受限、混沌不明的特性，卻

<sup>47</sup> 不著撰者，〈觀光蕃人的感想（新竹報）〉，原刊載於《理蕃の友》第2年3月號（1933年3月），頁159-160。

<sup>48</sup> 同註47，頁159。

<sup>49</sup> 淺野義雄，〈理蕃之友創刊祝詞〉，《理蕃の友》創刊號（1932年1月），頁4。

<sup>50</sup> 劉智濬，〈陳銘礪的生命原鄉追尋〉，《台灣文學研究》第4期（2013年6月），頁208。

是當地人真實的感受。主體的記憶揭露了前山居民在李嶼山戰役前，如何首當其衝遭遇掃蕩。古蒙仁將歷史化的李嶼山事件記憶第一層位連結後山當代議題，陳銘礪則文本化了比第一層位更不為人知的零層位。作者無法分辨〈最後的番刀〉、〈部落裡的一次事件〉中記憶層位的差別，因為在講述者的觀點中，這些事件都是李嶼山事件，而講述者不排除是日治時期無法發聲的當事人世代或後李嶼山世代。

一〇年代的殖民時期及七〇年代的後殖民時期，尖石有兩度受到台灣乃至亞洲社會矚目的階段，前者以討伐為背景，後者以亞運為契機。前述各節檢視各種印刷媒介與產物與民族記憶之間的關係，提出李嶼山事件在泰雅族人集體記憶中重大且依然有待探索的現況。李嶼山事件百年間引發的關注，包括前置期的推隘新聞、李嶼山三次戰役報導和圖象、後李嶼山時期的風景明信片 and 警員記事、七〇年代的報導文學、千禧年後的耆老口述等，其質與量或許堪為提出「李嶼山文學」一詞加以研究。

## 五、尖石前山抗日史與「第零次李嶼山戰役」

百餘年過去，尖石鄉當地泰雅族如何看待李嶼山事件呢？本節將比對耆老口述與日治時期報紙雜誌上的文獻，挖掘更多第一層位或第零層位的記憶。

2019年官大偉《李嶼山事件》一書，詳述清末開山撫蕃、採樟煉腦、總督府山地國有化、理蕃政策等治理歷程，從神話傳說、族群系統、部落位置、攻守同盟、文獻記載、耆老口述等角度，呈現泰雅族主體觀點的李嶼山事件始末，同時闡述官方於事件後的族群分化操縱、山林開發、土地控制、移住及同化政策，全面揭示當地族群近代以來的被殖民情境。

官大偉在2003年「原住民部落重大歷史事件調查」脈絡下採錄的這批耆老口述，以調查報告和學術出版等印刷媒介再現，成為尖石鄉泰雅族李嶼山集體記憶的第四個層位。書中透過耆老自述幼年所見或轉述父老所言，勾勒李嶼山記憶殘存在族人心中的樣態，其中有幾個鮮明的記憶點：一、屍骨成堆；二、李嶼山碉堡攻防戰；三、泰雅族的戰略；四、抗日族人及戰功。

嘉樂村的 Lawa Mequy (田寶珍) 提到一個充滿仇恨意味的身體記憶：

我在念小學的時候，日本老師帶我們去郊遊，李嶼山的山頂，我親眼看到地上有很多骨頭，Tayal 和日本人打仗留下來的，有頑皮的男同學，還把頭骨當作球在踢。<sup>51</sup>

此外，她對李嶼山古堡上祖先無法攻克的電網記憶分明（《李嶼山事件》，頁 68），也提到族人會利用日本人下溪取水等時機襲擊：「Tayal 的戰術就是用突擊的方式。躲起來，等時間到了，再出手……像打獵一樣，可以追一頭獵物追三天三夜（《李嶼山事件》，頁 69）。」

梅花村的 Badu Bonai (高良雄) 提到，祖先們趁颱風時搶奪日本大砲，從山頂推落溪谷。新樂村的田子雄也轉述長輩說過的日本人喝尿的故事，證實 Lawa Mequy 所說「古堡地勢高日軍取水困難」等說法。

耆老憶述時，很重視祖先家系、參與的戰役、戰功，也會提起被迫移住等往事。嘉樂村的 Talu Behu (邱致明) 說到，事件後家族被迫從馬里光遷村到那羅。他還記得堂哥 Losin 的爸爸 Hoyon 在李嶼山事件時俘虜了日人將軍，在輪流背負下山途中，Hoyon 怒罵：「豈有此理！為什麼日本人欺負我們，我們還要揸日本人？」，便拔刀砍下將軍的頭（《李嶼山事件》，頁 69）。

玉峰村的 Yumin Hayon (尤命·哈用)，強調他祖父 Batu Behu 是當時 Mrqwang 社頭目，領導作戰並砍下一位日本軍官的頭，「我不太知道，反正是很大的官」（《李嶼山事件》，頁 70）。他多次提到祖父是「真正的頭目」，反映 Batu Behu 肩負了跨族群攻守同盟任務，他的證言也符合學界對李嶼山第二次戰役的考證。

以上略舉官大偉所採錄的「子代」和「孫代」記憶，接下來筆者嘗試將它們和文獻進行對讀，以期獲得更多族群信息。

<sup>51</sup> 官大偉，〈耆老口傳的 Tapung 事件〉，《李嶼山事件》（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 年），頁 68。

首先，將梅花村 Badu Bonai「祖先們趁颱風時搶奪大砲」的說法，與官大偉整理的事件史加以比對，可知其傳述的內容極可能是今梅花村一帶部落，在 1912 年 8 月到 9 月期間令人振奮的一些成功襲擊。

官大偉寫道：1912 年 8 月 28、29 日第二次李嶼山戰役發生期間，正值颱風來襲，9 月 14 日再逢颱風，泰雅族兩次趁勢攻擊，利用暴風雨剪斷電話線，攻佔派巴拉分遣所，奪走砲彈火藥。15 日，日方派出軍隊 230 名，又下令台中廳派遣警察與隘勇 105 名、桃園廳 65 名、宜蘭廳 150 名增援，才解除包圍（《李嶼山事件》，頁 82）。

第二，將 Yumin Hayon 的家族記憶比對林一宏、王惠君的論文，可知描述的是同一次颱風期間後山方面的行動。

林一宏、王惠君指出：1912 年 9 月 11 至 17 日，玉峰社頭目 Batu Behu 帶領戰士，趁內灣發電所受損停擺、鐵條網停電、日警通信中斷之際，向李嶼山隘勇線發動反攻，攻陷太田山砲台、馬石分遣所等要塞，並焚毀據點房舍，奪取槍械火砲，幾將日警全數趕往前山。後因日方大舉增援，利用李嶼山監督所的砲火優勢轟擊，才阻止族人奪回李嶼山制高點。但日方蒙受重大損失，稱此役為「太田山事件」<sup>52</sup>。綜合 Yumin Hayon 與 Badu Bonai 所言，可以略窺 1912 年颱風期間，尖石前後山部族聯合反攻的壯舉。

第三，將 Talu Behu 提到祖先砍下日本將軍的頭一事，比對《臺灣日日新報》，可推測這位「將軍」應為太田角太郎警部補。

新竹廳樹杞林支廳的太田角太郎分隊長，在 1910 年 10 月內灣溪上游隘勇線推進期間擔任大隊長，曾引導「台中市官民協議會慰勞隊」參訪拉號社附近，上野隊長等人殉職的前山激戰地。1911 年李嶼山第一次戰役時，太田於 8 月 11 日下午三點負傷死亡，三天後消息發布於報紙上<sup>53</sup>。官大偉指出，8 月 3 日激戰開始日方便人傷損連連，佐久間總督親臨督戰，緊急電召桃園廳長追加 220 名警察與隘勇支援。討伐隊急於俯攻，希望儘速支援先行登上 Tapung 山的斥候隊，不料在險峻處遭泰雅族由上而下狙擊，雙方陷入肉搏，太田以下 18 名前鋒

<sup>52</sup> 同註 5，頁 92。

<sup>53</sup> 不著撰者，〈新竹前進隊情報〉，《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8 月 14 日，第 2 版。

戰死，後續者在血路中撤退。此役造成日本警部以下 79 名戰歿，63 名負傷（《李嶼山事件》，頁 79-81）。總督府將該山命名為「太田山」，以資悼念。逆讀上述報導可知，這是泰雅族在李嶼山鞍部的一次大捷。

第四，將 Lawa Mequy、田子雄的口述，比對吉野雍堂〈發自李嶼山本部〉一文，可知有關警員取水被狙擊，或缺水飲尿等憶述，所言不虛。

1913 年 3 月，李嶼山事件結束前半年，吉野雍堂在李嶼山隘勇線前進本部撰文，向日本內地讀者簡介「隘勇線前進」的戰鬥實況。他寫道：隘勇線前進，為警察執行的軍事性掃蕩，其危險無庸贅言，單就物資運補也困難重重。雖然輕便鐵道已從新竹站鋪設到樹杞林街軍用物資基地，但是從那羅山倉庫中繼站到李嶼山隘勇線前進本部，完全仰賴人力。物資貯存點沿著隘勇線據點向深山配置，暴露在敵人攻擊和掠搶之地。野馬敢溪、梅嘎浪溪的深谷，那羅山聞名的陡坡和峭壁，使物資運送到前進本部時已耗盡龐大苦力和警備員，遑論再配送到各部隊、小隊、乃至線上警察的手上。日常飲食和生活的艱苦，一言難盡。以炊事場為例，場地須設在水源地，但隘勇線哨點多半在稜線上，兩者間常有距離及高度落差，遠至相隔一里。飲用水、漱洗水和餐食通常一起運送，運水格外麻煩，必須考量輕便性和防漏等問題。在惡劣條件下，餐食難以保溫，食物經常冰硬難以下嚥，而運送者往來奔波暴露，更是冒盡危險<sup>54</sup>。

借助吉野雍堂的說明，不難想見隘勇線遭截斷、包圍或出現衝突時，線上日警斷糧斷水的窘境。因此，「喝尿說」並不是泰雅人的黑色幽默，或弱者的諷喻式反抗，而是戰地實況。

除此之外，筆者在 2020 年初以半結構式訪談方法，訪問尖石鄉九位耆老，包含：Sozi' Temu（黃未吉）、Yasuko（黃招甘）、Tali' Behuy（達利·貝夫宜）、Temu Kumay（李金水）、Yumin Hayon（尤命·哈用）、Atung Yupas（阿棟·優帕司）、Masay Sulung（馬賽·穌隆）、Hola Yumin（江瑞乾）、Makus Suyan（徐榮春），以下摘錄三位耆老轉述其父祖們的事件回憶。

<sup>54</sup> 吉野雍堂，〈李嶼山本部より（二）〉，《蕃界》第 2 卷（1913 年 3 月），頁 75-78。

Tali' Behuy 口述其父親與祖父、伯公、叔公兩代人，在事件中連袂作戰的情形。1912 年日軍攻上李嶼山，興建碉堡，安置砲台。族人為了阻止碉堡工事，不斷騷擾、攻擊砲台，或在日本人壕溝前埋伏。

我祖父說，他常常帶頭突破隘勇線，必須從地勢低的地方上跳，才能越過高處的隘勇線電網，潛入線內攻擊，因此突破電網相當不容易。他不只一次遇過日軍投手榴彈到我方陣營，族人撿起來就反扔回去，大家都很勇猛，部落同盟也曾一度攻陷李嶼山碉堡。<sup>55</sup>

1913 年日軍第一次提出議和，但是當泰雅族代表們前往時，卻遭日軍一陣毒打，族人認為日軍存心威嚇，因此決定出草抵抗到底。日方事後才派遣代表，送來米、鹽巴、味噌、醬油等致歉，再次遊說族人息兵，幾次協議後才達成停戰的共識<sup>56</sup>。

Yumin Hayon 說在事件發生前，就有上山的客家人警告族人說，日軍要進山鎮壓了，更提供槍枝、彈藥給各部落頭目，頭目們將武器平均分配到每戶人家，並擬定作戰計畫。最大規模的一次作戰，是 1911 年青壯年突襲日軍營地，將大型軍火全部推落河谷那次。1912 年戰事進入白熱化，族人狙擊過河日軍、誘殺日警小孩、偷襲日軍碉堡、馘首衛兵。隨後，日軍決定在バガ山興建砲台，使周圍部落遭受巨大威脅。有些部落為了躲避砲擊，乾脆棄村逃到後山。砲台築好以後，日本人便封鎖了上山的通路，使族人沒有必要物資，部落大頭目 Batu Behu 不忍族人挨餓受凍，只好向日軍投降<sup>57</sup>。

Hola Yumin 說他的曾祖父、伯公、叔公、伯父，三代人都參與了李嶼山事件。與 Yumin Hayon 有相似口述，在事件爆發前從客家人口中聽到日軍即將入山鎮壓的消息。1912 年後山各個部落開始激烈反抗，直到 1914 年也並未完全恢復平靜。戰役期間，泰雅族完善的分工及各部落的聯合作戰，埋伏、游擊、

<sup>55</sup> Tali' Behuy (達利·貝夫宜) 口述，劉柳書琴紀錄，〈我祖父們的李嶼山事件〉(2020 年 2 月 25 日，尖石國小)。

<sup>56</sup> 同註 55。

<sup>57</sup> Yumin Hayon (尤命·哈用) 口述，劉柳書琴紀錄，〈我祖父們的李嶼山事件〉(2020 年 1 月 18 日，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宇拾 (Ulay) 部落)。

狼煙等戰術，曾經有效阻止日軍前進。「當時許多受困在半山腰的日軍，因後勤補給被截斷，只好喝尿求生，極為狼狽。」他也對李嶼山事件提出他的獨特觀點：「我祖父兄弟三人抗戰到最後一刻被抓。一度受到日軍拷打、拘禁，最後成功逃脫、遷徙並回歸。戰役期間有許多家族投降，他們如今大多已沒落，因此我認為曾祖父們的抗戰精神是我家族得以興旺至今的關鍵。」<sup>58</sup>

根據 Tali' Behuy 與 Yumin Hayon 的口述，對讀石田貞助警視 1935 年的證言，可以想像當地人的抵抗，補充第一層位的主體記憶。石田警視對他指揮的第二回討伐作戰有如下回顧：

「注意！小心！附近有敵人！」苦米地的低沉雄厚聲音，提醒著大家。勇敢的高橋及高塚二人應聲道：「嗯，再忍耐片刻就好了。」「沒關係，我可以的。」……深夜的密林中，三人排成一列，前方立著鐵盾，敵方不斷地發射子彈打在鐵盾上，但三人依然匍匐前進。……

以上為大正元年李嶼山第二回討伐之役的當時情景，兩個部隊約 150 名人員擔任先鋒，抵達預定地後，便立即開始建造掩堡。敵方仍然不斷進行攻擊，妨礙我方作業。敵人身上披蓋著茅草樹枝潛行而來，或開槍射擊，或丟出石頭，或高聲吶喊，雙方幾近肉搏戰，令人不禁毛骨悚然。儘管如此，我方絕不能因此退縮，得趁天色未明前，建造完畢可容一人身軀大小的掩堡。否則一旦天亮，我方先鋒部隊勢必成為敵人的明顯標靶，絕無活路。而敵營亦不容小覷，竟然能夠建造出令文明人嘖嘖稱奇的加蓋掩堡。<sup>59</sup>

石田警視還提到：某次傍晚，日方先在防線上發動攻擊，他下令警察隊利用地上物作掩護埋伏，以仰姿藏身在壕溝之中，用腳夾槍待命，果然誘出敵人前來偵查，遂給予痛擊。泰雅族的掩堡（壕溝）看似很大，堅固難攻，但後方粗糙，僅

<sup>58</sup> Hola Yumin（江瑞乾）口述，劉柳書琴紀錄，〈我祖父們的李嶼山事件〉（2020年1月19日，竹東車站附近）。

<sup>59</sup> 石田貞助，〈回憶李嶼山討伐之役〉，原刊載於《理蕃の友》第4年10月號（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5年10月），頁71。

用茅草、木材遮蓋。因此他下令改由弱處進攻，用黑火藥替代照明彈，著火後投入敵陣，再追擊五發炸彈。經過三小時肉搏奮戰，敵方終於無法再逼近防線<sup>60</sup>。

石田在 1935 年「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召開之際，為文回顧當年戰術，流露治理者的優越感。如今逆讀這位高階官員的憶述，使我們有機會了解口述者未嘗細述的「泰雅掩堡」。官大偉的研究也指出：總督府討伐台灣山地原住民時，引進了日俄戰爭的技術。1904 年日軍攻打旅順口高地時運用的壕溝戰、通電鐵絲網，以及山砲等輕便易拖動的武器等，都被用在仰攻山區制高點，對抗手無寸鐵的泰雅族，極為殘酷（《李嶼山事件》，頁 64）。討伐者的證言，雖能反證泰雅勇士的能動性，然而與現代作戰技術的懸殊對陣，卻致使幾個世代的泰雅族猶如不幸的印地安人，努力從戰爭的陰影中掙脫。

綜合官大偉和筆者的訪談可知，官大偉主要訪談「後李嶼山世代」（子代），耆老回顧重點為三次戰役，來源為抵抗當事人的口述，或受訪人直述自身在日治時期被迫參訪戰爭遺址的體驗。其中曾有受訪者細述 1911 年太田先鋒隊慘敗之役和 1912 年太田山戰役，亦即第一、二次李嶼山戰役的高峰。筆者的訪談對象為四〇到六〇年代出生的跨時代及戰後第一代，屬於李嶼山事件的孫代，他們皆無日語教育經驗，回憶內容為三次戰役，來源出自父代轉述，少數人聽過祖代親述，Tali' Behuy 與 Hola Yumin 甚至能細述第三次對基那吉群的作戰。至於尖石前山的反抗，官大偉和筆者的受訪者都未提起。

事實上有關前山的抵抗，楊緒賢論文、古蒙仁、陳銘礪皆有涉及，本文借助下列研究，說明它們作為「李嶼山事件先導戰役」的性質。林一宏有關 1909 年內灣上坪隘勇線的研究，指出尖石前山戰役對奪下李嶼山制高點的戰略意義：加拉排、尖石、內橫屏山至上坪溪的隘勇線建置時，遭到加拉排群、美卡蘭群（Mekarang）激烈抵抗，大漢溪方面的卡奧灣群也前來聲援，大小戰鬥不絕。九月，新竹、桃園兩廳警察隊聯手才攻佔油羅山高地，串連自馬武督（今關西鎮）至上坪溪的隘勇線。藉此切斷內灣前山諸部落與後山馬里光群的聯繫，取得通往李嶼山制高點的西北方通道，迫使加拉排社於 1910 年屈服<sup>61</sup>。

<sup>60</sup> 同註 59。掩堡，指戰壕。

<sup>61</sup> 同註 5，頁 90。

劉澤民有關 1910 年內灣溪上游隘勇線的研究，也詳述該線的先導功能。他指出該線推進的目標如下：第一到六次，與前一年修築的帽盒山隘勇線相連，並從武羅灣沿內灣溪上游南岸，延伸到李嶼山與鳥嘴山間的鞍部；第七次，在田勝台、茅原、中之島、上野山、拉號社等西側高地，配置大砲，強化火力網<sup>62</sup>。這七次的推進，為次年的李嶼山隘勇線前進（1911 年 8 月 1 日到 10 月 31 日），確立了兵戰基地、補給線及戰略優勢。而李嶼山制高點的奪下與碉堡建設，又為接續的馬里科灣隘勇線（1912 年 9 月 24 日到 12 月 17 日）及基那吉隘勇線（1913 年 6 月 25 日到 8 月 2 日）的推進，奠定基礎。

筆者認為，應將三條隘勇線推進期的衝突統稱為「第零次李嶼山戰役」，藉此突出迄今為止被忽略的尖石前山族群的抵抗。前山抵抗的族群，包括屬於馬里光群的拉號社、西拉克社、鳥嘴山社等，澤敖列群的麥樹仁社、加拉排社等，以及霞喀羅群的野馬敢社，美卡蘭群的梅嘎浪社，基那吉群的馬胎社等等。

內灣溪上游隘勇線推進期間，大湖支廳長兼前進隊第二部隊隊長的飛田孫兵衛，於 1910 年 7 月 21 日重傷，24 日死亡。大湖支廳辦公室前設置昭忠碑，由佐久間總督親題「昭忠」碑額，內田民政長官撰文。稍早於 7 月 9 日，日方在拉號社、田勝台附近作戰時，還有新竹廳上野昌治巡查戰歿<sup>63</sup>。時至今日，尖石鄉仍沿用殖民政府命名紀念的上野山、飛田山、太田山等等，無言地憑弔日方功勳者。反觀那羅溪流域、油羅溪上游的泰雅族犧牲者，和更多未被當時媒介記錄的當地抵抗者呢？各社被迫屈服和遷徙的歷史，又該如何被銘記？

李嶼山事件是否可逕稱為「李嶼山戰爭」？筆者對此問題抱持肯定答案。吉野雍堂曾在文章中開宗明義指出「隘勇線前進」和「討伐」的功用不同，但性質相似，兩者交互為用。「前進」為陸軍野戰組織用語，隘勇線前進的目的是將綏服地納入普通行政區線內長期治理，討伐是一時性的膺懲，達成包納之後即可解除。布署或討伐都由警察官執行，必要時出動軍隊。因此，雖未及戰爭規模，但性質上就是戰爭。譬如馬里科灣隘勇線推進時，前進隊便配置了事務

<sup>62</sup> 劉澤民，〈「故新竹廳巡查五十嵐長輝外拾名之碑」與馬里柯灣原住民抗日事蹟探討〉，《臺灣文獻》68 卷 3 期（2017 年 9 月），頁 60-72。

<sup>63</sup> 參見同註 62，頁 48。同註 17，頁 125。

部、非常通信所、現金前渡官吏派出所、物品倉庫等陸軍機關，有功人員經蕃務本署調查確認後，舉行一年一度聯合論功行賞，比照國際戰爭的規格給予褒揚，戰歿者合祀在靖國神社，並予遺族撫卹<sup>64</sup>。吉野雍堂對一〇年代日本讀者的解說，不意在百年後成為了泰雅族歷史的證言。

本節透過文獻與口述的比對，使第四層位尖石鄉耆老的漂流記憶獲得確認和定位，也試圖使被遺忘於集體記憶之外混沌不明的前山抵抗記憶略微浮現，並經由層位分析，發現「後李嶼山世代」（子代）在主體記憶的保存傳遞上，無論在七〇年代或 2000 年以後，都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李嶼山事件在千禧年前後被政府正視，事隔九十年子代和孫代的耆老對於事件的記憶已逐漸風化，所幸經由五個記憶層位的逆讀確認，李嶼山事件無疑是一場戰爭。第零次戰役，只是本文的分析用詞，希望藉此有助於揭露前山人的抵抗經驗。在 2019 年尖石民族實驗國中、嘉興民族實驗國小、新樂民族實驗國小、葛菴拜民族實驗小學等前山四校，積極推動民族實驗教育的此刻，新的歷史傳播媒介——實驗教育，應能透過泰雅族銀少共創，開展「李嶼山事件」的主體詮釋，實踐「減少種族不平等」的 SDGs 精神。

## 六、結論

本文嘗試透過不同時代、屬性、大眾性程度不一的印刷媒介，透過層位結構的觀察法，梳理尖石鄉泰雅族李嶼山集體記憶的形態，並歸納出從上而下的五個記憶層位（圖十一），以下逐項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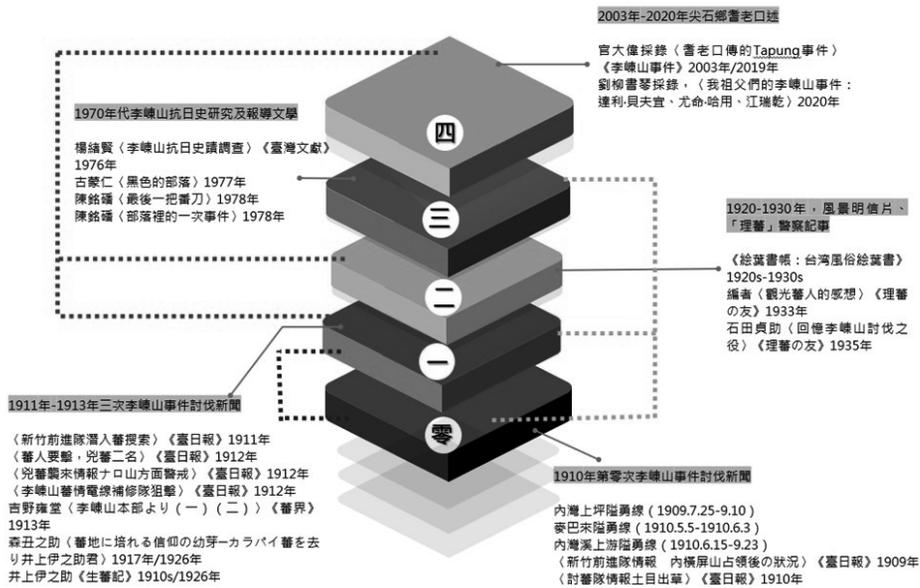
第四層位為官大偉等人執行「原住民部落重大歷史事件調查計畫」期間（2003 年訪錄／2019 年出版），挖掘和公布的耆老記憶；以及筆者在 2020 年訪錄的「我祖父們的李嶼山故事」。

第三層位為七〇年代李嶼山抗日史論著及報導文學，包括楊緒賢等第一代研究者對李嶼山戰役的調查，以及三篇尖石鄉地方書寫〈黑色的部落〉、〈最後一把番刀〉、〈部落裡的一次事件〉。

<sup>64</sup> 吉野雍堂，〈李嶼山本部より（一）〉，《蕃界》第 1 卷（1913 年 1 月），頁 108-111。

第二層位為二〇至三〇年代官製記事 and 觀光商品壓倒當地人記憶的時期。本文分析隱身於視覺圖像中的帝國之眼，同時對《理蕃之友》中的官員記事進行批判性閱讀。

尖石鄉李嶼山事件集體記憶層位圖



圖十一

第一層位為 1911 至 1913 年間官方利用《臺灣日日新報》和《討蕃記念寫真帖》，對三次李嶼山戰役的報導和影像記錄。

第零層位為總督府在 1909 至 1910 年間為啟動李嶼山戰役，在前山兩翼推進內灣上坪隘勇線、油羅山隘勇線、內灣溪上游隘勇線，而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留下的報導。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本質是社會凶殘與文化抹黑，因此釐清歷史記憶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是必要功課。本文採用後殖民批評，一方面透過對既有符號、形式與媒介的重看 (revisioning)，包括新聞記事、編導式攝影、口傳故事、報導文學、口述歷史；另一方面，透過記憶層位的梳理與對位閱讀，探討記憶與政治在特定脈絡下的生產關係和效應。

李嶼山事件，是一場牽延多年、跨州廳的北台山地戰爭。目前學界指涉的李嶼山事件，著重 1911 至 1913 年間的三次大規模衝突，本文肯定這樣的觀點，但呼籲給予前山抵抗史更多重視。台灣山地歷史的解殖工作，必須從帝國歷史敘述和話語的破壞做起。本文挪用以隘勇線前進作為李嶼山三次戰役論述的邏輯，亦即挪用主導李嶼山戰役定義的帝國話語，增加第零層位的史料挖掘與定義，將此戰爭至遲從 1909 年即已開始的事實指明出來。透過尖石鄉的案例，可以印證學者藤井志津枝、近藤正己等人的「殖民地山地戰爭」主張<sup>65</sup>。看見不同媒介如何各自記憶或抹消這場戰爭，不同媒介和層位之間又有怎樣複雜的辨證、浮沉與交錯。

在李嶼山集體記憶百餘年的累積中，有將近 90 年（1913-2003）的層位不在尖石當地，非由當地人的媒介記錄，是漂流在他者文化版圖中的記憶。這些記憶直到擁有「主體敘史能力的世代」出現，輔以政策機制和轉型正義，才有統整詮釋的契機。記憶的回家，經過「橫的移植」，對讀、逆寫、主體補述為必要步驟。主體重塑「縱的繼承」，將多源的記憶層位清理，容納到民族記憶之中，才能逐漸轉換為批判性資源。

---

<sup>65</sup> 近藤正己，〈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軍隊と植民地戦争〉，收於坂本悠一編，〈帝国支配の最前線：植民地〉（東京：吉川弘文館，2015 年），頁 44-74。藤井志津枝，〈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台北：文英堂，1997 年），頁 228-248。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 やまと新聞台灣支局編，《台灣週遊概要》（台北：成文，1985年複刻本，1927年出版）。
- 二松啟紀著，郭清華譯，《繪葉書中的大日本帝國》（台北：麥田，2020年）。
- 井上伊之助，《生蕃記》（東京：警醒社書店，1926年）。
- 日本旅行協會台灣支部編，《台灣鐵道旅行案内・昭和十四年版》（台北：日本旅行協會台灣支部，1939年）。
- 古蒙仁，《黑色的部落》（台北：時報文化，1978年）。
- 全國中等學校地理歷史科教員協議會編，《台灣省台灣旅行報告》（一）、（二）（台北：成文，1985年複刻本，1932年出版）。
- 成田武司編，《台灣生蕃種族寫真帖（附：理蕃實況）》（台北：成田寫真製版所，1912年）。
- 坂本悠一編，《帝国支配の最前線：植民地》（東京：吉川弘文館，2015年）。
- 佚名，《繪葉書帳：台灣風景繪葉書》（台北：赤崗兄弟商會發行，年份不詳），現藏於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圖書館。
- 李資深編，《台灣案内》（台北：成文，1985年複刻本，1931年出版）。
- 官大偉，《李崧山事件》（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年5月）。
- 林修澈，《台灣原住民部落事典》（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8年5月）。
- 陳銘磻，《大地阡陌路》（台北：業強，1990年）。
- 陳銘磻，《最後一把番刀》（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3年）。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灣原住民圖像（上）（下）》（台北：國家圖書館，2003年）。
- 張良澤、高坂嘉玲合編，《日治時期（1895-1945）繪葉書：台灣風景明信片（全島卷）》（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2013年）。

- 張洋培、林瓊柔，《原住民部落重大歷史事件：李嶧山事件研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年）。
- 傅琪貽，《日本統治時期台灣原住民抗日歷史研究——以北台灣泰雅族抗日運動為例》（北京：團結，2015年）。
- 遠藤寬哉、岡野才太郎，《台灣蕃族寫真帖》（台北：遠藤寫真館，1911年）。
-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二年討蕃記念寫真帖》（台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3年）。
- 藤井志津枝（傅琪貽），《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台北：文英堂，1997年）。
- 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二、論文

### （一）期刊論文

- 王恭志，〈新竹泰雅族勇士參與李嶧山事件歷程分析及其對鄉土教育的啟示〉，《竹縣文教》第44期（2013年12月），頁79-83。
- 林柏燕，〈前進李嶧山〉，《新竹文獻》第13期（2003年8月），頁6-33。
- 林一宏、王惠君，〈從隘勇線到駐在所：日治時期李嶧山地區理蕃設施之變遷〉，《臺灣史研究》14卷1期（2007年3月），頁71-137。
- 柳書琴，〈井上伊之助《生蕃記》研究：隘勇線社會的風俗誌〉，《臺大文史哲學報》第92期（2019年11月），頁117-161。
- 姜義鎮，〈李嶧山古戰場〉，《新竹文獻》第13期（2003年8月），頁34-47。
- 梁廷毓，〈凝視下的破口：鳥居龍藏的台灣原住民攝影中之違抗面孔〉，《原住民族文獻》第34期（2017年10月），頁68-85。
- 黃榮洛，〈李嶧山方面前進記（明治四十四年，1911）〉，《新竹文獻》第13期（2003年8月），頁48-57。
- 楊緒賢，〈李嶧山抗日史蹟調查〉，《臺灣文獻》27卷4期（1976年12月），頁87-95。

劉澤民，〈「故新竹廳巡查五十嵐長輝外拾名之碑」與馬里柯灣原住民抗日事蹟探討〉，《臺灣文獻》68卷3期（2017年9月），頁60-72。

劉智濬，〈陳銘磻的生命原鄉追尋〉，《台灣文學研究》第4期（2013年6月），頁199-230。

錢今昔、王星，〈文化地理學的主題與過程研究〉，《人文地理》4卷2期（1989年2月），頁47-51。

## （二）學位論文

蔡政惠，〈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自1945到1987〉（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年）。

## 三、雜誌文章

不著撰者，〈觀光蕃人的感想（新竹報）〉，原刊載於《理蕃の友》第2年3月號（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3年3月），頁159-160。

石田貞助，〈回憶李嶼山討伐之役〉，《理蕃の友》第4年10月號（1935年10月），頁71。

吉野雍堂，〈李嶼山本部より（一）〉，《蕃界》第1卷（1913年1月），頁108-111。

吉野雍堂，〈李嶼山本部より（二）〉，《蕃界》第2卷（1913年3月），頁75-78。

野呂寧，〈行け見よ而して永住せよ〉，《旅》2卷12期（1925年12月），頁10-15。

淺野義雄，〈理蕃之友創刊祝詞〉，《理蕃の友》創刊號（1932年1月），頁4。

## 四、報紙文章

不著撰者，〈蕃人の密告〉，《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7月2日，第2版。

不著撰者，〈新竹前進隊情報 內橫屏山占領後の狀況〉，《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8月12日，第2版。

不著撰者，〈討蕃隊情報土目出草〉，《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5日，第2版。

不著撰者，〈新竹前進隊情報〉，《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8月14日，第2版。

不著撰者，〈新竹前進隊潛入蕃搜索〉，《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7日，第2版。

不著撰者，〈蕃人要擊，兇蕃二名〉，《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3月28日，第2版。

不著撰者，〈兇蕃襲來情報ナロ山方面警戒〉，《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9月18日，第1版。

不著撰者，〈李崧山蕃情電線補修隊狙擊〉，《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0月1日，第2版。

不著撰者，〈タケジン支隊の動靜，蕃地縱斷と各要害の占領〉，《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8月2日，第2版。

不著撰者，〈佐久間總督の凱旋〉，《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9月6日，第2版。

## 五、電子媒體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來源：<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2020年12月24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寫真資料庫〉，（來源：<https://reurl.cc/ObjlVr>，2019年11月8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寫真資料庫〉，（來源：<https://reurl.cc/bRLnyX>，2020年12月20日）。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來源：<https://reurl.cc/M7jj6n>，2019年11月1日）。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來源：<https://reurl.cc/k0RLv3>，2020年12月20日）。

國立臺灣大學，〈日治時期繪葉書資料庫〉，（來源：<http://cdm.lib.ntu.edu.tw/cdm/landingpage/collection/card>，2020年10月8日）。

## 六、其他

徐榮春，〈新竹縣尖石鄉嘉興國小辦理泰雅族 Nahuy 小學實驗教育課程計畫書〉，嘉興國小學校內部文書。

Tali' Behuy（達利·貝夫宜）口述，劉柳書琴紀錄，〈我祖父們的李嶼山事件〉（2020年2月25日，尖石國小）。

Yumin Hayon（尤命·哈用）口述，劉柳書琴紀錄，〈我祖父們的李嶼山事件〉（2020年1月18日，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宇拾（Ulay）部落）。

Hola Yumin（江瑞乾）口述，劉柳書琴紀錄，〈我祖父們的李嶼山事件〉（2020年1月19日，竹東車站附近）。